

# 程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学建构及当代借鉴

程必定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肥 230051)

**摘要:**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元典,北宋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从理学角度在四个方面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底蕴:一是“以德为尊”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二是“以善为先”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品格,三是“以民为本”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底层基础,四是“和合为贵”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博大胸怀。这种厚植同时也是一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学建构。对新时代弘扬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和发挥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周易程氏传》;文化主体性;中国传统文化;程颐

**中图分类号:**B244.6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 6 月 2 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sup>[1]</sup>主体性体现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形成与对象物客体的支配关系、引领地位及发展趋向。文化主体性是国家和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对文化的主动塑造与提升,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构建主体,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对文化发展的主动作为,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保持高度的认同感和独特性,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周易》在剖析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原初性关联中,理性地挖掘出赋予人恒常意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根脉和主干,从源头上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先由孔子作《易传》,丰富了《周易》奠定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底蕴,后在不同时期又有诸多学派大师对《周易》进行阐释,持续厚植中华文化

主体性底蕴,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保障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从未间断、一脉相承。其中,北宋时期程颐所著《周易程氏传》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细研此著可以发现,其对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底蕴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德为尊”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二是“以善为先”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品格,三是“以民为本”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底层基础,四是“和合为贵”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博大胸怀。如今,这四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巩固和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 一、以德为尊: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我意识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累积和精神凝聚,在发展中形成的国家或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人是文化主体性的构建者、承载者。一个长期蒸蒸日上的国家或民族,文化主体性要求构建者的自我意识必须始终具有先进性。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先进性突出体现为“德”文化。这是

**作者简介:**程必定(1948—),安徽肥西人,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院长,安徽省程颢程颐理学研究会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发展战略、地域文化。

因为,我国古代的文化起点很高,源头重德。中国文化元典《周易》,开篇“乾卦”的象辞就响亮地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次篇“坤卦”的象辞也对应地提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把有形的天、地、君子和无形的道德并列,不仅把“德”上升到至尊的高度,还“以厚德载物”彰显“德”的力量。尊德意识在中国历史久远,华夏先祖轩辕皇帝就怀有“修德振兵”之志,古代典籍中记载和论述“德”的内容更是相当普遍。如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了“德”字的表符,在金文中“德”亦有多处记录和多种形体;《尚书》的核心历史观也是“德”,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物”等<sup>[2]</sup>;孔子在《论语》中频频提到“德”,如“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德不孤,必有邻”<sup>[3]</sup>,对“德”的认识达到新的境界;庄子在《逍遥游》中还说:“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sup>[4]</sup>,把“德”的认识上升到政治高度;老子更写下《道德经》五千言,“德”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历史的累积,“德”文化在我国世代弘扬传承,成为中华文化的根本属性,从源头上确立了“德”的先进性,以先进性牢固地铸就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自我意识的历史底蕴。

程颐坚持“德”的先进性,在《周易程氏传》对《周易》卦辞、爻辞及孔子《易传》的详细阐释中,从不同角度先后提出了尊德乐道、君德、同德,以及谦德、顺德、修德、养德等理念和规范。这些理念和规范都是维护和彰显“德”的先进性,体现出“以德为尊”思想,在中国历史进入宋代以后,起到了“以德为尊”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自我意识的积极作用。

尊德乐道。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天理,天理就是天道,亦即是最高的、无容置疑的道理。如在对“乾卦”的解释中程颐提出:“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也。”<sup>[5]1</sup>这样的道理天都不违背,人就更不可违背,必须遵循,这样,“德”才能扎根于人心、盛行于社会,并世代传承,程颐称之为尊德乐道。如他在对“蒙卦”的阐释中提出:“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sup>[5]19</sup>,意即不尊德乐道,也就无所作为

了。乐道亦即信道、守道,显然,人们只有信道才能守道,只有守道才能尊德,信道、守道与尊德并举,从而长期保障中华文化主体性自我意识的先进性。

君德。《周易程氏传》强调,国家统治者特别是人君之德极为重要。一个国家的人们信道、守道与尊德,首先需要统治者特别是人君要信道、守道与尊德。如在“观卦”的阐释中指出,“当观天下之政化,则人君之德可见矣”<sup>[5]82</sup>,并指出,“圣贤之君,近之则见其道德之盛。”<sup>[5]81</sup>因为“人君德及于民,而民随之”<sup>[5]71</sup>,可以引导天下人尊德乐道。程颐还认为,人君之德关键在于无私。如在“比卦”的阐释中提出,“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sup>[5]37</sup>,认为“无私,天德也。”<sup>[5]54</sup>封建皇帝坐拥天下,为什么还要强调无私之德呢?程颐在“同人卦”中对此的阐释是:“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sup>[5]56</sup>,也就是说,这是人君肩负的责任所在,对保障中华文化主体性自我意识的先进性具有表率作用。

同德。《周易程氏传》认为,要使天下人尊德乐道,那就要求天下人都能同德,抑或德合。如在对“乾卦”的阐释中提出,“乾坤纯体,不分刚柔,而以同德相应”<sup>[5]1</sup>,这是以乾坤比喻天下“同德”的必要性;又如在“临卦”的阐释中提出,“人君之于贤才,非道同德合,岂能用也?”<sup>[5]79</sup>这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说明统治者内部、特别是君臣之间“德合”的重要性;再如在对“萃卦”的阐释中将君德与百姓相联系,认为“君之德,民所归也”<sup>[5]184</sup>,这是从君民关系角度说明同德或德合的重要性,从而会在全社会形成中华民族“以德为尊”文化主体性自我意识的先进性。

此外,在对《周易》相关卦辞、爻辞的阐释中,程颐还提出了谦德、顺德、修德、养德等理念和规范。如在对“谦卦”的阐释中提出了“谦德”,曰君子“有功劳而谦德者也……乃其常行”,并指出周公是谦德的楷模。<sup>[5]63</sup>在对“离卦”的阐释中提出了“顺德”,曰“人之顺德,以养而成”<sup>[5]119</sup>,强调通过养成教育提高个人的修养,国家和社会才能形成“顺德”之风。在对“晋卦”的阐释中提出“顺德之臣上附大明之君”<sup>[5]139</sup>,意即有德之君必然会吸引有德之臣。

在对“离卦”的阐释中提出了“修德”，曰“君子修德以俟时”<sup>[5]155</sup>，强调君子要时时修德，长期坚持，与时俱进。在对“颐卦”的阐释中提出“养德”，曰“推养之道，养德养天下，莫不然也”<sup>[5]107</sup>，指出养德必然就是养天下。显然，这些谦德、顺德、修德、养德等理念和规范得以遵循、滋养，都会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以德为尊”文化主体性自我意识的先进性。

## 二、以善为先：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品格

民族品格是一个民族文明素质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精神标识，也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道德支撑。中华民族品格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的核心地位，突出人本主义精神，提倡认识自我、净化自我，最基本的是认识和塑造人的本性，以体现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人的本性是善是恶？先贤们围绕这个人类古老的哲学问题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展开了热烈而深刻的讨论，《周易》问世之后，在人的本性是善是恶问题上先后出现了五种学说：一是人的本性善说，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儒家的孟子；二是人的本性恶说，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法家的荀子；三是人的本性无善无恶说，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思想家告子；四是人的本性有善有恶说，代表人物有汉朝的董仲舒、杨雄、王充及唐朝的韩愈等；五是人的本性善恶因人而异说，代表人物是北宋的思想家司马光。其中，孟子的性善学说作为儒家的正统思想，以“善”为导向塑造中华民族品格，影响最为深远和广泛，如宋代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就直言“人之初，性本善”，直接影响了我国后来的千年历史。实际上，《周易》强调阴阳相合、矛盾转化，分析的是“变”，没有对人的本性是善是恶作出定论，但在社会生活中，人性的善恶问题不可逃避。对此，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从理学“义理”观的视角出发，既继承儒家性善学说的正统思想，又汲取其他学说的合理因素，从教化的角度扬善抑恶，提出“以善为先”的教化导向，对“以善为先”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品格，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综观《周易程氏传》，程颐针对当时的社会问

题，围绕“以善为先”的教化导向，对《周易》的相关卦辞、爻辞作了有的放矢的解释，主要是从天理的角度提出了仁为善本、从个人的角度提出了以善修身、从国家的角度提出了以善治国、从社会的角度提出了以善育俗，多角度地“以善为先”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品格。

仁为善本。程朱理学崇仁，认为仁是天理的必然要求。所以，程颐首先从天理的角度提出了“仁为善本”的思想。如在对“复卦”的阐释中，就鲜明地提出“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sup>[5]97</sup>，直接而明确地表述了符合天理的仁，应该成为元善的本源，亦即仁者必善，善者必仁。因为程颐认为，仁道即天道，天下之公是天道的必然趋势，而善者知仁道、重仁行，是天道对人性的基本要求，所以，在对“大有卦”的阐释中就明确提出“天下之事……必善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sup>[5]58</sup>，进一步强调了“仁为善本”的极其重要性。此外，在对“乾卦”的阐释还提出“体仁……合于礼”<sup>[5]4</sup>，也就是说，善既体现仁道，也符合礼的规范，应该以善为先，广施天下，可以收到扬善抑恶的效果。

以善修身。修身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基石，《周易程氏传》对《周易》大量章句的阐释，从个人的角度阐述“以善修身”的道理。如在对“复卦”的阐释中提出，“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唯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sup>[5]97</sup>，亦即君子会知道要改正或避免出现“不善”问题而自觉地以善修身。并强调，以善修身必须坚持以道德养身，如在对“明夷卦”的阐释中，程颐认为，以善为先的人，必“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顺也”<sup>[5]142</sup>，重视道德在修身中所起的内在作用。不仅如此，程颐更强调人的修身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还兼善天下，如在对“观卦”的阐释中就鲜明地指出，“君子怀负才业，志在兼善天下”<sup>[5]83</sup>，亦即个人的修身是为了服务国家、服务天下，这正是继承了家国情怀的儒家传统。如孔子早在《论语·雍也》篇中就告诫人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sup>[6]</sup>，无论是“立”还是“达”都要顾及他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在《尽心篇上》中也明确指出：“穷以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sup>[7]</sup>，

成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世格言和奋斗目标。这样日久累积,必然会铸就“以善为先”的中华民族优秀品格。

以善治国。通过《周易程氏传》对《周易》诸多卦辞、爻辞的阐释可以看出,程颐从国家角度强调以善治国,而以善治国则出于“善在义理”,即君主治国上合天道、下合民心,就会治理好国家。如在对“乾卦”的阐释就明确指出,“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sup>[5]3</sup>,意即统治者体现天道的意图治国,国家才能得到安宁、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天道就是义理。如在对“师卦”的阐释中指出:“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善谓克胜……以统制于众”<sup>[5]31</sup>,明确提出了治国善在义理的思想。治国如何实现“善在义理”呢?那就是要“安民”“济民”,如在对“比卦”的阐释中告诫统治者善治国“以安民也”<sup>[5]35</sup>,在对“蛊卦”的阐释中告诫统治者善治国还要“以振济于民,养育其德也。”<sup>[5]74</sup>为了“安民”“济民”而善治国,在对“比卦”的阐释中还响亮地提出“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sup>[5]37</sup>,在对“益卦”的阐释中还进一步指出,“圣人利益天下之道,应时顺理,与天地合”<sup>[5]168</sup>,这就符合义理,国家也会善治了。显然,程颐以善治国重在义理的主张,与理学的义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以善育俗。以善治国不仅需要君子们带头以善修身,而且全社会还应形成重善行善的良好风俗,这是更难的大事。怎么办?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从社会的角度提出了以善育俗的主张。如在对“噬嗑卦”的阐释中提出,兼善天下可使民俗善,而“民俗善则政化善也”<sup>[5]83</sup>。为什么呢?在“大畜卦”的阐释中对此作了回答:因为“不独于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sup>[5]103</sup>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通过教化途径以善育俗。如在对“比卦”的阐释中说:“明教化以善其俗……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sup>[5]20</sup>;又如在对“贲卦”的阐释中还说:“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sup>[5]88</sup>程颐认为,刑罚虽然必要,但目的在于教化,如在对“比卦”的阐释中就说:“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sup>[5]20</sup>因为人的道德和习惯是养成的,教化就是

一种有效的养成教育,养成教育必须长期坚持。如在对“渐卦”的阐释中就指出,“教化之于人,不以渐,其能乎?修风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渐也。”<sup>[5]215</sup>渐即长期坚持、逐渐推进,如此而为,必会“以善为先”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优秀品格。

### 三、以民为本: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底层基础

文化主体性是通过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体现出来的,但“人”并不只是少数先知先觉的人,而是人民大众,是广义的“民”,他们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主体性最广泛的底层基础,决定着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生命。中华文化作为世界唯一世代传承、从未间断、悠久而有活力的优秀文化,就是由于有“民”这样深厚而又广泛的底层基础。《尚书》有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sup>[8]</sup>,这是夏朝奠基者大禹对后世子孙的教诲,意思是说,人民是立国的根本,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根本才能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说明中华文明早在夏朝时期就产生了“以民为本”思想。特别是集伏羲、周文王、孔子“三圣”智慧的《周易》,更是饱含着“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以后又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从而厚植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底层基础。其中,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更强调“以民为本”思想,对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底层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民为本”是中国儒家在治国方面的基本思想,程颐从理学角度发展了这个思想,主要是从义理观出发,强调“以民为本”治国是天道或天理对治国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朝廷君臣们治国的天然责任。深入研究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通过对有关卦辞、爻辞的阐释可以发现,其对“以民为本”思想的发展和丰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得民心,从政治上强调“以民为本”思想;二是济民困,从经济上强调“以民为本”思想;三是抚民安,从社会上强调“以民为本”思想;四是施民教,从教育上强调“以民为本”思想。

得民心。程朱理学认为,民心反应天理、天道,是“天心”在民间的体现,统治者必须在政治上得民心,才能统治天下。如在对“乾卦”的阐释中指出:

“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sup>[5]3</sup>,而所体之“天道”亦即广得民心,意即统治者得民心才能符合天道的规律,这样治国,国家才能得到安宁、发展。又如在对“巽卦”的阐释中提出,朝廷“命令政事,顺理则合民心,而民顺从矣”<sup>[5]231</sup>,这里所说的顺理,亦即是顺合天理。程颐在对《周易》有关卦辞、爻辞的阐释中,还在政治上把顺理扩展到封建朝廷君臣关系,认为顺应该成为君臣政治关系的主线,这样,君臣有治国安天下的共同志向,符合大众的期望,朝廷作出的“命令政事”才顺合民心,程颐称之为“从众”“众志”。如在对“晋卦”的阐释中说:“顺之极也……谋从众则合天心……大明之君,众志所同也”<sup>[5]140</sup>,意即君臣政治关系很顺的时候,君臣们从符合大众的期望谋划国家大事,是合天心的,朝廷的决策就能与大众的期望相符。

济民困。这是从经济上强调“以民为本”思想,对此,《周易程氏传》有大量的阐述。如在对“解卦”的阐释中说:“王者法天道,行宽宥,施恩惠,养育人民”<sup>[5]159</sup>,称以民为本、济民养育是王法天道;又如在对“剥卦”的阐释中说:“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sup>[5]192</sup>,称济民养育是统治者知理;在“坎卦”的阐释中甚至直言,“人君之道,不能济天下之险难,则未为大,不称其位也”<sup>[5]118</sup>,治国以民为本更是统治者不可推辞的天然责任,人君若做不到就与其位不相称,言下之意甚至会被推翻,亦即民如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是也。又如在对“蛊卦”的阐释中说:“以振济于民,养育其德也”<sup>[5]74</sup>,是从“德”的高度提出“济民”的极其重要性,称济民养育是统治者之德,等等。正如《管子》所言:“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sup>[9]</sup>,说明只有先解决人民的经济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奠定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底层基础。程颐作为思想家,不可能提出济民致富的具体办法,但以上见解既有高度又有深度,足见对“济民”的看重程度。

抚民安。这是从社会上强调“以民为本”思想,《周易程氏传》对此也有大量的阐述,最重要的是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统治者“安民”重在使民志定,安民心,使人民能安心发展经济。如在对“履

卦”的阐释中说,“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sup>[5]43</sup>;又如在对“比卦”的阐释中指出:“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宁,方且来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宁,君不能独立,故保民以为安”<sup>[5]35</sup>,意即老百姓由于势单力薄,不能保其安宁,需要君王和政府保民安民。二是强调统治者要重视社会治理,特别是治乱,使人民能安居乐业。如在对“剥卦”的阐释中说:“阴道盛极之时,其乱可知,乱极当思治,故众心愿载于君子”<sup>[5]94</sup>,统治者治世乱、保民安,是人民的重托,更是统治者的责任。为了有效地治乱,还应有必要的刑罚,如在对“噬嗑卦”的阐释中就明确提出,“天下之事不得合也,当用刑罚,小则惩戒,大则诛戮以除去之,然后天下之治成矣。”<sup>[5]84</sup>“天下之事不得合”即乱,治乱世而刑罚,当然是必要的,而且只有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才能做到,治乱安民是统治者不可推辞的天然责任。三是强调统治者要施善政。如在对“否卦”的阐释中提出,“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从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sup>[5]50</sup>程颐不仅积极赞扬统治者施善政,而且还主张,统治者所施之政是否是善政,还要看在民间的实际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如《周易程氏传》在对“观卦”的阐释中就提出,“人君欲观己之施为善否,当观于民,民俗善则政化善”<sup>[5]83</sup>,“中孚卦”的阐释肯定施善政“以至诚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sup>[5]245</sup>,这正是“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

施民教。我国历史上十分重视教育,封建社会各级命官的重要任务就是督学,施民教是从教育上强调“以民为本”思想,整个一部《周易程氏传》,就是一部教君教臣又教民的理学教科书,其中,有很多内容是教民的,涉及修身、齐家,分布在很多卦辞的阐释中,但最重要的是以教化来教民。如在对“比卦”的阐释中说:“明教化以善其俗……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sup>[5]20</sup>因为人的道德和习惯是养成的,而教化就是一种有效的养成教育,因此,《周易程氏传》很重视养成教育。如在对“离卦”的阐释中,就明确提出“人之顺德,由养而成”<sup>[5]119</sup>,强调人应通过自我养成教化育德,因而积极主张教民要教化。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之所以从未间断而

一脉相承,并且以国家形态延续发展,与历史形成的重教育、施民教是不可分的。

#### 四、和合为贵: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博大胸怀

“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论语》有言:“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sup>[10]</sup>,意即礼的作用以达到和谐为最重要,先王们治理天下以此为美。但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追求和谐,也可能会有行不通的地方。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和谐的可贵,而不用礼来加以约束,也是不可行的。回顾中国的历史,奴隶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是很严峻的,到春秋时代这种社会关系开始破裂,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已属常见。对此,孔子提出“和为贵”思想,目的是缓和不同等级之间的对立,以安定社会秩序。但孔子提出“和为贵”的前提是要以礼节制,不能为和而和,不是无原则的调和,强调礼制之下以和为贵的合理性,开拓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博大胸怀,并一直传承发展。到了宋代,中华民族进入大融合的新时代,程颐结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为化解民族融合中出现的矛盾,在《周易程氏传》中经常使用“和合”这个新概念,把“和”与“合”相联系,把“合”作为“和”的目的,把“和为贵”扩展为“和合为贵”,以理学视野对《周易》相关卦辞作出新的阐释,对后人影响深远,为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博大胸怀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观《周易程氏传》有关卦辞、爻辞的阐释可以发现,其对“和合为贵”思想的阐述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和合为贵”合于天理,二是“和合为贵”是君子之道,三是“和合为贵”可美美与共,四是以“和合为贵”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和合为贵”合于天理。孔子提出“和为贵”的前提是以礼节制,“礼”并不是形式,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因而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概念,所以孔子针对西周后期“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而要“克己复礼”。在古老的中国,人们总是认为政治制度是符合天理的,而“合”作为“和”的目的,是对政治制度的一种完善。所以,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使用“和合”这

个新概念,也含有这样涵意。“和合”为什么会体现天理呢?程颐通过对《周易》诸多卦辞、爻辞的阐释,认为“和合”遵天意、合人心、体仁、合礼。如在对“晋卦”的阐释中就指出,和合是“谋从众”,古人曰:“谋从众则合天心”<sup>[5]140</sup>,显然,合天心即遵天意,谋从众即合人心。在对“损卦”的阐释中也指出,和合是“其能尽众人之见,合天地之理。”<sup>[5]166</sup>在对“乾卦”的阐释中,不仅指出“利者和合于义也”,还认为“体仁”“合于礼”<sup>[5]4</sup>,也就体现出天道或天理精神。这些论述都表明,“和合为贵”合于天理。

“和合为贵”是君子之道。宋明理学以为,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天理,而“和合为贵”合于天理,践行“和合为贵”也是君子之道。如在对“否卦”的阐释中,就明确提出“夫上下之交,刚柔和会,君子之道也”<sup>[5]50</sup>,意即刚柔和会是符合天地之交之理,因而是君子之道,所以在该卦阐释中接着说:“君子道行,则与其同类同进”<sup>[5]52</sup>;又如在对“同人卦”的阐释中言:“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则圣贤大公之心也”<sup>[5]53</sup>,意即君子间的和合要出于公心,君臣之间更是如此。比如仍在“同人卦”的阐释中就指出:“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sup>[5]56</sup>在对“睽卦”的阐释中还提出:“人情乖违,求和合之”<sup>[5]151</sup>,亦即当出现人情违背天道或天理精神时,必须以“和合”而化解之,就会出现“合而益和则吉也”<sup>[5]154</sup>的结果,这是人人所希望的。

“和合为贵”可美美与共。世界总是存在差异的,如阴阳差异、民族之别、文化不同,《周易》对此称差异为“睽”。程颐认为,有差异不仅不是问题,而要通过“和合”互通相融,可以收到美美与共的效果,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程颐在对“睽卦”彖辞的一段长句阐释,对此作了深刻而通俗的描述:“以天地男女万物明之:天地高下,其体睽也,然阳升阴降,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则同也;男女异质,睽也,而相求之志则通也;生物万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阴阳之气,则同类也。物虽异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众,睽散万殊,而圣人为能同之。故处睽之时,合睽之用,其事至大。”<sup>[5]150</sup>这里所言的“合睽之用,其事至大”,就如我们当今所说的“美美与共”,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客观存在差异的伟大!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引用南非大主教图图的那句名言:“为我们的差异而欢欣!”<sup>[11]</sup>程颐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判断,并影响后人对世界客观存在差异的看法,对以“和合为贵”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博大胸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和合为贵”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使天下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周易程氏传》以“和合为贵”为依据,积极主张建设文明社会秩序。如在对“贲卦”的阐释中指出,“物之合则必有文……文明所以为贲也”<sup>[5]87-88</sup>,“贲”有饰美之意,亦即文明可以建美我们的社会。又如在“离卦”的阐释特别肯定文明对社会秩序的价值,是“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sup>[5]119</sup>,还希望统治者要推进文明建设,指出“文明中顺之君,其明如是,所丽如是,大善之吉也。”<sup>[5]120</sup>并且在“旅卦”的阐释中预测,社会“有文明柔顺之德,则上下与之”<sup>[5]229</sup>,我们的社会将多美好!早在北宋时期,程颐在其《周易程氏传》就能提出这样的见解,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他提出的这些见解又是以《周易》的相关卦辞、爻辞为依据,如“噬嗑卦”就专门讲人及社会矛盾的磨合问题,是建设文明社会秩序的基础,这就更说明了《周易》伟大的历史价值,以及程颐以“和合为贵”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博大胸怀的积极作用。

### 五、《周易程氏传》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底蕴的当代借鉴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提出“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主张具有广泛的契合性。早在1926年1月,郭沫若先生发表了《马克思进文庙》一文,描绘了一场马克思与孔子的千年对话,对话中,马克思惊叹在遥远的东方遇到了孔子,呈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汇通。<sup>[12]</sup>这虽然是篇带有神话般的会通,但却从宇宙观、社会

观、道德观等方面,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之间高度契合,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哲学经典《周易》及先秦诸子百家的辩证思想不谋而合。北宋时期程颐所著《周易程氏传》在以上四个方面对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底蕴的历史贡献,是对易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当今发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作用推进“第二个结合”,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来的,它主要是通过文化吸引力而体现出来。表面上看文化似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巨大力量,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并从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等四个方面,对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精辟阐述。<sup>[13]</sup>而这四个方面,都与发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作用密切相关。

首先,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在全国各族人民,《周易程氏传》在以上四个方面对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底蕴的历史贡献,可以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通过提升中华文化构建者的自我意识,从思想深处保障中华文化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点很高,其突出表现是起源于《周易》的“德”文化,程颐抓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性,突出“以德为尊”对《周易》卦辞、爻辞作出详细阐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尊德乐道、君德、同德,以及谦德、顺德、修德、养德等理念和规范,这些都会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自我意识的先进性,从而以全国各族人民为根基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厚植不竭的动力,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不同角度体现出中

国价值观,而中国价值观的传播主体是全国各族人民。《周易程氏传》在以上四个方面对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底蕴的历史贡献,对全国各族人民而言,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诸多中国价值观,而且可以巩固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使全中国人民自觉地践行中国价值观,在当今特别是自觉地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以亿万人的行动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比如,《周易程氏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善为先”道德观的解释,从天理的角度提出了仁为善本的价值观,从个人的角度提出了以善修身的价值观,从国家的角度提出了以善治国的价值观,从社会的角度提出了以善育俗的价值观,这可以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品格,更有利于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人民的力量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再次,文化的软实力在于其独特的魅力,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重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特别是在世界最早提出“以民为本”思想,从社会底层保障了中华文化能成为世界唯一世代传承、从未间断、悠久而有活力的优秀文化。《周易程氏传》继承和发展了“以民为本”思想,在政治上强调“得民心”,在经济上强调“济民困”,在社会上强调“抚民安”,在教育上强调“施民教”,目标是建设小康、实现大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诉求与愿望。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一脉相承,深得人民的拥护,可以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从而会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底层基础,在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牢牢地扎根于全国各族人民的独特魅力,对如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历史借鉴价值。

最后,《周易程氏传》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底蕴的历史贡献,对当今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也有借鉴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族人民与世界人民的交往越来越多,中国人民自觉地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开展与其他国家的人文交往,通过国际人文交往会使其他国家的民间乃至政界、学界能真实

地了解中华文化,从而助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特别是《周易程氏传》强调“和合为贵”理念,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不仅不会造成文明的冲突,而且会交流互鉴、美美与共,颠覆了由美国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并被西方一些政治家长期作为打压中国说辞的“文明冲突论”。而早在 1922 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访问中国后感慨地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对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若能被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sup>[14]</sup>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后,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得到了快速提高。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10 年来,我国坚持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与不同文化沿线国家之间积极开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仅促进各国的发展而受到广泛拥护,联合国的官方文件也频频出现“一带一路”,是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得以提高的生动体现;又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及世界发展倡议、世界和平倡议、世界文明倡议得到许多国家的呼应,都是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得以提升的一个个实证。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将会持续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 六、结语

《周易》作为中华文化元典,从源头上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周易程氏传》又从“以德为尊”“以善为先”“以民为本”“和合为贵”四个维度,对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底蕴做出了历史贡献。现在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上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性,对如今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有着明确的主体性,而中华文化主体性则是当代中国人国民身份的思想基础。它可以引领国民端正心态,自觉地承担国民应尽的义务与责任。所以,从《周易程氏传》中吸取厚植中华文化主体性底蕴的思想与智慧,在如今是很有必要的。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06-03(01).
- [2] 四书五经·书经[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3: 1.
- [3] 四书五经·论语[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3: 3+15+27.
- [4] 庄子读注·逍遥游[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8: 5.
- [5] 程颐. 周易程氏传[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 [6] 四书五经·论语·雍也[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3: 26.
- [7] 四书五经·孟子·尽心篇上[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3: 102.
- [8] 四书五经·书经·五子之歌[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3: 39.
- [9] 管子·牧民[M]. 李山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2.
- [10] 四书五经·论语·学而[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3: 2.
- [11] 余秋里. 易经简释[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社, 1983: 8.
- [12] 郭沫若. 马克思进文庙[J]. 洪流, 1926, 第一期第七号.
- [13] 习近平. 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2-12-31(01).
- [14] [英] 罗素. 中国问题[M]. 秦悦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6: 12.

(责任编辑 张亨明)